

思想

缩小收入差距难度高过振兴经济

——盛世危言之民生篇(四)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对于权力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人主张通过“大政府”以及严刑峻法来解决,这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同时,另外一些人希望通过垄断的介入,以二次调节的办法来治理,这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并且可能是越治越乱。要正本清源,必须针对权力过大及缺乏制约这一点,从体制上综合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换,防止政府权力越位,并对权力予以制约。陈志武在“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证明,代议制政府+市场经济模式下人民的收入差距趋同速度最快,而据笔者的分析,权力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最为要害,这也证明了中国由非代议制政府与非市场经济(“第四类国家”)走向非代议制政府与市场经济(“第三类国家”)之路越来越走不通。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来限制权力越位,减少权力参与垄断竞争,乃是根本之道。在20多年的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必须循序渐进地启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真正下决心厘清公权力与私权力的界限,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当前,治理腐败的一个基本宗旨就是“扩大市场活动的盈利机会,提高创新活动收益”,这首先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政府应当减少诸如行业准入限制、关税、限额、价格限制、价格支持、对特定产业的补贴优惠等干预措施,拆除腐败滋生的温床,为市场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和空间。在政治制度安排上看,治理腐败的一个基点就是“切断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桥梁,建立民主廉洁的政治管理制度”。这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公务员选用制度,公务员通过政治市场上的竞争机制产生,优胜劣汰,废除政治职位上的终身保险制。此外,实行决策民主化,决策程序不民主,个别官员在行政事务上随意性过大,这是少数不诚实的官员腐败的前提条件。通过各个行政管理层次上建立民主机制,不仅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而且可以在官员间实行相互监督,减少腐败的机会。

对于权力赋予的垄断部门竞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则要努力打破垄断,进一步放开管制,引入竞争机制。虽然政府去年颁布了“非公36条”,但是迄今更多的还是作为指导性原则。目前有资料显示,在广东省,国有经济可进入80多个行业,而非经济中的外资可进入60多个,内资非公企业仅能进入40多个。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管制

尚且如此严厉,其他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而放开管制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就是让民营资本能够进入传统的权力垄断行业,所以在“非公36条”之后,还得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一份对内开放或市场准入时间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改变以权代法,排除权力对市场竞争的不正当干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无法有本质改善的时候,由少数人组成的有谋利冲动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其力量往往超过“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导力量,只有让那些原本散漫的利益群体能有途径彼此基于共同利益来发出共同的声音,权力垄断部门的触角才不得有所收敛。

无论是权力垄断还是权力越位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根源都是中国自上而下的缺少监督与制衡体系的行政管治体制与迫切的市场化进程结合的特殊产物,而在中国当前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由于新旧利益安排格局共存的特点,会造就一批从这种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中获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当改革进程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严重阻力。尤其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与权力相勾结,更易于将制度变迁拖入长期非均衡的封闭路径中,而面对利益集团存在的制度构成,新的自发型构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手段支

持,往往会出妥协或同化。例如:房地产厂商与地方政府构成的利益集团,已经对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形成了强势垄断。面对这样的现实,纯粹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的自发式制度变迁,效率是有限的,非得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可,尤其在一些权贵资本主义严重的领域,暂时的妥协与掩盖问题,只会日后以更加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中国“不买房联盟”的出现,可以说已经是在用一种静态的方式来表达与政府的对抗情绪,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依然大可质疑。这是因为,政府决策制定者的个人偏好及其收益目标函数与全社会的目标函数存在差异,当政府考虑到面临的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等成本因素时,容忍和漠视低效率的制度存在和政府的长期管治体制与迫切的市场化进程的假设,最终会导致“诺斯悖论”的出现。这在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房地产改革中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等大量事例中都已充分证明。

基于这一点,笔者在此提醒所有寄希望于中国的收入分配能够尽快改善的人们,必须认识到,这将是一个巨大、艰难、充满挑战、比实现经济增长难度更大的制度创新工程。(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滨海新区金融街新景 资料图

■蓄势天津

50年后,天津找回发展基点

今年2月,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尚待国务院最后审定时,在深圳举办了首次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天津滨海新区的三城论坛,就三城在中国综合改革试验过程中如何作为各抒己见。达成的共识有两点:三城要以金融的功能拓展和改革创新,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制造业的升级。

两个多月后,天津滨海新区的扩大开发开放列入了国家总体战略规划,金融的改革创新被列入滨海新区近期主要任务的首位,并给予一系列先行先行的权力。由此看来,无论中央还是基层,对天津后发的(相对于浦东和深圳)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看法一致。一方面,中央任命有央行行长背景景的戴相龙市长主政天津,早有战略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加快发展滨海新区,把恢复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地位单靠制造业、科技创新、航运物流及商贸业的长足发展,是确立不起来的,或者说还不能完全确立。必须具备强大的金融支撑,在周边地区、城市产生巨大向心力,非到此无以获取最稀缺的资源才算数。近20年来,天津一直处于很尴尬的境地,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式微,北方经济中心的重镇雄风不再。说到底,这是因为丧失

了城市的金融功能和辐射作用。插入一段历史。在共和国建立之前,三大战役结束,解放军准备过长江之时,党中央就派刘少奇到天津,为中国革命最后胜利寻求经济支撑。刘少奇同志当时在天津纠正了某些“左”的倾向,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恢复天津证券交易所。老一辈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务实眼光令人敬佩不已。今天,天津要重振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级的战略地位,仍然要求更高,关注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区出色完成这些任务,政策就是实实在在的,可望落实;反之,这些任务完成不力,则这些政策就是不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等,关键看你怎么办。

现在的问题是:竖起旗帜是一回事,但立竿见影收到实效是另一回事。天津滨海新区以至天津市发展金融业进而改革创新,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与沪、深相比,滨海新区是金融改革的后来者,形象地说,这类似下围棋,若处于下风,就要打人求活,

王恺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以求分势,然后才是求胜。而这需要勇气和直面风险。因此,后发固然有优势,但这大多只是理论上的,后发的劣势倒是十分具体的。大致有三大问题迫在眉睫:金融业态建立和扩张的人才支持、金融工具的丰富和业内的创新冲劲、金融功能的背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机制的市场化发挥。“功夫在诗外”,未雨绸缪考虑金融业发展的外部综合因素,可能比金融本身更重要,极端一点说甚至决定这种战略意图的成败和前景。

先说人才。近悉,深圳要建一座“南开桥”,以铭记南开人对深圳(主要是金融业)的贡献。这说明天津金融人才的培养和为我所用并非难题。但天津要立即起步金融改革创新,人才又是不够的,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为别人做了嫁衣。就今天的天津而言,要聚集金融人才,不是“临渊羡鱼退而结网”,而是要赶紧设法把网掌握在自己手中。就金融而言,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规模、金融份额、金融占GDP的比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从业机会,是吸纳人才的关键。人才多了,有了聚集效应,才能从中产生改革、创新的精英。这道理不是很浅显吗?

■心有灵犀

规则变迁中的投资机会



袁宜
华东师范大学
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

市场游戏规则的变化,往往孕育着投资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很多时候往往又是正面的,甚至是暴利的机会。

眼下正在发生的“基改”,也就是封闭式基金在契约到期后并不清盘,而是转变为开放式基金继续存续。这其中或许孕育着金矿。

之所以规则改变多半会带来投资获利的机会,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主观上,规则制定者往往有意让规则变迁成为市场的利好。如果新规的出台会对参与游戏的某方产生不利的影响,则必会遭其极力反对,新规的推行便会遇到阻碍。遭人反对,甚至攻击,这对于游戏规则制定者来说,总是头痛的事。而试图做出一些实绩,这又是每位规则制定者的宿愿。为了保证变革的顺利推行,也为了保持和谐稳定的大局,规则变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这样的压力下,规则制定者通常会权衡再三,尽量将新规的推出转化成因为各方所乐于接受的利好消息。因此,规则条款精心打磨,各个部门通力配合,共同营造起一个喜庆祥和的气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客观上,由于规则制定百密一疏,如果在推行中发现疏漏而对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规则制定者一定会尽力弥补,如果疏漏的影响是正面的,则往往会被放任自流。由此,正面的投资机会就会显得略多一些。由于这样的投资机会是出乎所有人预料之外的,因此能否及时地把握住这种机会,确实是对投资者的洞察力和敏锐性的考验。

让我们回到“基改”这个正在发生的故事。

首先,从封闭式向开放式基金的转变,意味着封闭式基金的交易价格与净值之间巨大折让的收敛。这已经让先知先觉的投资者赚了一笔。然而新规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潜在的获利机会。

为了避免封转开后引发巨额

赎回,新规要求封闭式基金到期摘牌后,先进入一段集中申购期,等申购资金到账后,再开放赎回功能。这样,一来可以让基金保有充足的资金以应对可能发生赎回,而不必抛售资产筹措资金,二来新投资者踊跃的申购也可以安定基金老持有人的信心,不再急于赎回。

但同样这是这个稳定措施,使基金在集中申购期结束后,持仓比例会有显著的下降。假使对后市研判乐观,这个新生的开放式基金必然会进入一个快速建仓期。那么,手中握有大把现金的新基金该如何安排投资方向呢?还是原先那个基金经理,还是原有那套投资理念,对投资品种的偏好应该还是一样吧。再者,原本在封闭式基金规模下重仓持有的个股,如今因为新增资金的到位,一下子变成了重仓股,继续加仓的余地巨大。既然是看好的股票,为什么不再加仓?况且,与其买入其他股票给别人抬轿,何不抬高自己的股票,抬高自己的净值呢?

基于这样的思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基金行业在转为华夏平稳增长基金的首日,其“重仓”股票中居然同时出现了三只涨停。作为第一只到期的封闭式基金,基金行业在进入转换期以前的原有规模仅有5亿元,经过三周的集中申购,一下子增加了18.64亿现金。面对数倍于现有投资规模的现金,新基金的持仓意愿强烈。10月9日,即基金行业封转开新募资金到账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其市场表现已向人们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加仓效应。看起来,管理层似乎也乐于见到新老基金的平稳过渡以及新基金的开门红。毕竟成功的“基改”试点,有助于后续改革的全面推进。事先意识到这一机遇的投资者,想必现在已经乐开了花。

今后一段时期,封闭式基金还将陆续到期转为开放式,开放式基金的复制之风也正方兴未艾,因而,规则变迁中孕育的加仓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机会还将继续演绎。然而,不同个案所引发的加仓效应的具体大小,以及由此衍生的跟风投机机会的强弱,还将取决于新老基金规模的对比、原基金重仓个股的特性、基金经理对彼时行情的判断,以及彼时跟风者的多寡。刻舟求剑是要不得的。

■NBA眼光

激流长江 圣水恒河

——我看西方媒体上的印中龟兔论

今日西方,印度是个炙热话题。媒体只要提起它,总要与中国作一番比较,且结论一致:那是乌龟与兔子之赛,尽管中国暂时走到了前面,印度必将后来居上。你假如常往欧美,看多了这些煽情报道,决定要去印度,而且是假道北京或上海,住了两天后到达新德里,那种反差不能不让你对此类言论深深怀疑:乞丐成群,垃圾成堆,市政设施陈旧,在那广泛的贫困中,现代化建设只能算是点缀。

统计数据就更能说明问题。1979年中国GDP是印度的约1.4倍,但人均GDP差不多,但到2005年,中国GDP就是印度的2.8倍了,人均GDP也远远拉开了。趋势是差距仍在扩大。

经济发展还要看后劲。谁到底更有后劲呢?分析一下两国的经济结构吧。中国着重制造业,那需要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的支持,所以发展不仅带动了交通、运输、电力、通讯、原材料加工等,也推动了工业体系和就业市场的发展。而印度的龙头是IT行业,且是那些能够外包的产业,尽管近年成长迅速,但

仅占整个GDP的1%,就业人数仅有100多万。人们常说,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各国站到同一起跑线上,那是因为此类行业对基础设施和辅助行业的依赖不大。因为在高科技泡沫中铺设的跨洋光缆,美国公司很容易就把工作转移到印度,那里能提供大量的技术高、成本低,又能说英语的专业人员。但是,这类行业经济辐射力到底有限。

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2002年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20%,而印度是5%),所产生的经济优势是长期的,并有望差还会继续拉大。

如此,我们不免要问,西方观察家判断的偏差在那里?——因为信念,以及信念带来的偏见和勇气(瞎说的勇气)。本来只是假设,却因在下意识里根深蒂固,却成了不容置疑的结论:(1)西方方式的民主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2)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是经济繁荣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如此看世界,结论自然轻而易举:印度有西方方式的议会民主,那必定会有更强大的经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济生命力。这一政治经济模式当然有其真谛,但不能由此认定为宇宙真理。举例,在今天的全球化中,如果按上述模式,崛起的更应该是墨西哥,而不是中国或印度。墨西哥“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缺;西式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地域上最接近美国,又是NAFTA的成员国。

与中国相比,印度确有很多优势:11亿更加年轻的人口,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潜在市场,英国殖民地的过去为它奠定了社会制度化的基础,如重视法制、保护财产权等,也带来英语的普及和与英美国家的接轨。印度理工学院是世界一流学府,已为西方输送了最优秀的科研和教育人才。

至于印度的劣势,西方人因在认识上受制于社会的局限性而沉默。欧美沃说是“言论自由”的

■新垦地

谁在俄罗斯还有安全感

俄罗斯《新报》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后,莫斯科官方尽管竭力想要降低此事的政治意义,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起“与受害者职业紧密相关”的谋杀。俄罗斯媒体和在野的政治家则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谋杀。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1982年进入俄国发行量最大的《消息报》,后来由于俄国各大媒体被国有资本收购的趋势日益明显,她在1999年离职并到了俄罗斯为数不多的独立媒体《新报》做调查记者和政治观察员。除了关注车臣的人权外,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还在调查莫斯科戏院和别斯兰事件数百人质死亡的真实原因,并且一直在揭露俄国军界的腐败。

依靠石油美元堆积起来的经

济复苏,普京成功地唤醒了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自己赢得了威望。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这样对现政权持续不断地批评很容易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甚至有时会被当作是反俄的,从而招致“合法的”打压。赫鲁晓夫的孙女尼娜认为,在政治目的的推动下,民族主义在现在的俄罗斯已逐渐成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并不断向各个领域蔓延,这使转型中的俄罗斯面临着重回前苏联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时代的危险。

在过去的15年中,俄罗斯共有42位记者被害,在普京的六年任期内,已有12名记者被暗杀。尽管总检察长柴卡已宣布将亲自侦办此案,但《新报》已成立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命案调查小组与基金会,悬赏2500万卢布缉拿真凶,这些动作显

梁强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示,该报对检方侦破此案丝毫没有信心。在俄罗斯,对警察的信任指数一直在零以下,今年9月最新的指数是负24。

俄罗斯人刚开始富裕些,却失去了更多的安宁。新一轮的暗杀浪潮现在已经席卷俄罗斯商界、政界和新闻界,这些领域从苏联解体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职业。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后一周,俄塔社商业主管沃罗夫又身中多刀死于家中,16日,莫斯科商业银行经理坎特利遭乱枪扫射身亡;18日,远东达利涅沃市市长候选人佛特雅诺夫又遭不明身份者枪

杀。再往前一个月,俄罗斯央行第一副行长科兹洛夫也因调查洗钱而喋血街头。

根据俄罗斯内务部的统计,2000年至2005年俄凶杀案的平均立案数比1992年至1999年增加了10.6%。1995年的立案数是31700起,而2002年已经达到32300起。在叶利钦时代,每10万人中有19人遭凶杀,到普京时代,这一数字增加到22人,而同期美国的对应数字是5人,其犯罪高峰1980年也不过是10.2人。俄罗斯有80万警察,相当于每10万人中有超过550名执法人员,而欧洲每10万人只有300名警察,但凶杀案数字不到2人。

2004年克里姆林宫破坏了叶利钦当政时与商界达成的政治互信,用行政手段推毁了尤科斯。主持这件事的人可能想不到,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可以重新不择手段清除竞争对手的信号。普京总统的权力布局和调整因为波利特科

夫的贴子上多半印着“福、寿、财、禄”之类的吉祥话。中国人活着,面子非常要紧,极为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自己在旁人眼中的位置,又喜欢与人比——当然是暗暗地比。又因为生态环境恶劣,资源紧缺,历史上多次灾难,战争频繁,饥荒、流行性疾病等社会性动荡不断,中国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所以,中国人鼓励“积极思维”,而西方则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是文化导致了人们行为的差异。印度人能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是社会稳定的因素,而这种文化也比较缺少物质的动力,所以,印度的独立快60年了却并没有带来经济面貌的根本改变。中国人节俭、勤劳、克己,活得太累,又因为爱“比”,内心就更加痛苦了,所以中国人“不患寡,患不匀”。但这种文化包含着激励因素,能转化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动力。

说实在的,中国文化太沉重了,而且容易激化社会危机,中国人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民族。但是,这种文化能够推动物质的进步。就因这样的历史文化因素,才有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也是因为这样的文化,早年一无所有去海外淘金的华人,面对社会歧视,在恶劣环境中奋斗,最后也能赢得一片天地。

在2000年上台时,普京向俄罗斯人民保证将建立法制秩序。在六年的任期内,他确实在努力解决问题以实现当初的承诺,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恰恰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普京在任内以强力手段在俄罗斯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但随着他即将卸任,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又开始抬头。

而更复杂的是,普京是否会真正交出权力以及将权力交给谁,这已成为克里姆林宫集团内部斗争的导火线。专家们统计,现在每年带有政治、经济背景的惩戒性凶杀达到了500起,但实际上这个数字还可能高出一倍,因为许多这种案件的受害者都不敢报案。著名政论家梅德韦杰夫认为,凶杀数量的增加可能证实了后普京时代的权争已经开始。“那些希望利用局势动荡谋取利益的人,现在已经着手寻找新的牺牲品。”